

民國叢書

第三編

2.



錢穆著

先秦諸子繫年考辨

自序

余草諸子繫年，始自民國十二年秋。積四五載，得攷辨百六十篇，垂三十萬言。一篇之成，或歷旬月，或經寒暑。少者三四易，多者十餘易，而後稿定。自以創闢之言，非有十分之見，則不敢輕於示人也。藏之篋笥者又有年，雖時有增訂，而見聞之陋，亦無以大勝乎其前。茲當刊布，因加序說，粗見凡例。

蓋昔人考論諸子年世，率不免於三病。各治一家，未能通貫，一也。詳其著顯，略其晦沉，二也。依據史籍，不加細勘，三也。惟其各治一家，未能通貫，故治墨者不能通於孟，治孟者不能通於荀。自爲起迄，差若可據，比而觀之，乖戾自見。余之此書，上溯孔子生年，下逮李斯卒歲，前後二百年，排比聯絡，一以貫之。如常山之蛇，擊其首則尾應，擊其尾則首應，擊其中則首尾皆應。以諸子之年證成一子，一子有錯，諸子皆搖。用力較勤，所得較實。此差勝於昔人者一也。惟其詳於著顯，略於晦沉，故於孔墨孟荀則考論不厭其密，於其他諸子則推求每嫌其疏。不悟疏者不實，則實者皆虛。余之此書，一反其弊。凡先秦學人，無不一一詳考。若魏文之諸賢，稷下之學士，一時風會之所聚，與夫隱淪假托，其名姓在若存若亡之間者，無不爲之緝逸證鑒，辨僞發覆。參伍錯綜，曲暢旁達，而後其生平出處師友淵源學術流變之跡，無不粲然條貫，秩然就緒。著眼較廣，用智較真。此差勝於昔人者二也。而其精力所注，尤在最後一事。前人爲諸子論年，每多依據史記六國表，而即以諸子年世事

實繫之。如據魏世家六國表，魏文稱侯之年推于夏年，壽據宋世家及六國表，宋偃稱王之年定于孟子遊宋是也。然史記實多錯誤，未可盡據。余以此書於先秦列國世系，多所考核，別為通表，明其先後。前史之誤，頗有糾正。而後諸子年世，亦若網在綱，條貫秩如矣。尋源探本，自無踵誤襲繆之弊。此差勝於昔人者三也。

太史公序六國表曰：『秦既得意，燒天下詩書，諸侯史記尤甚，爲其有所刺謔也。其後詩書復見，而史記獨藏周室，以故滅。獨有秦記，又不載日月，其文略不具，然亦有可頗采者。余因秦記，踵春秋之後，起周元王，表六國時事。』此史公自著其爲六國表之所本也。秦記既略，又自孝公以前，僻在雍州，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，中國諸侯以夷翟遇之，故其時秦記載諸侯事當尤忽。今六國表自秦孝公以前最疏脫不具者以此。幸其時諸侯史記，猶得有遺留後世者，厥爲魏冢紀年。晉太康時，汲縣人發古冢，得竹書七十五車，中有紀年十三篇。自杜預諸儒皆定其爲魏襄王時魏國之史記。然今世所行，復非原書之真。而唐司馬貞爲史記索隱，時采其文以著異同，可資比準。惟貞自謂『紀年之書，多是譌謬，聊記異耳』，又曰『辭卽難憑，時參異說』。因亦未能悉心參校，以救史記之失，良可惜也。

原昔人多不信紀年者亦有故。一則魏冢原書，久逸於南宋之際。今本爲後人蒐輯，多有改亂，舛誤缺略，面目全非。學者不深辨，遂謂汲冢紀年不可信，一也。再則其書言三代事，多與相傳儒家舊說違異。如益爲啓誅，太甲殺伊尹之類。儒者斥其荒誕，遂不依引，二也。又謂其書記春秋時事，如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，晉

獻公會虞師伐虢，滅下陽，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，明係春秋後人，約左傳之文，倣往例而爲之，與身爲國史，承告據實書者不同。因遂忽視三也。夫紀年乃戰國魏史，其於春秋前事，容采他書以成。至言戰國事，則端可信據。如魏世家索隱引紀年曰：『二十九年五月，齊田勝伐我東鄙。九月，秦衛鞅伐我西鄙。十月，邯鄲伐我北鄙。王攻衛鞅，我師敗績。』此非當時史官據實書事之例乎？至益爲啓誅，太甲殺伊尹，則戰國雜說，其與儒家異者多矣。紀年亦本當時傳說書之孰信孰否，今且未能遽斷，要足爲考古者備一說，不當株株於一先生之言，而深斥之也。自清以來三百年，學者治其書，不下十數家。至於最近，海寧王國維本嘉定朱右曾書爲古本輯校，又爲今本疏證，然後紀年之真僞，始劃然明判。而猶惜其考證未詳，古本紀年可信之價值，終亦未爲大顯於世也。

史記載春秋後事最疎失者，在三家分晉，田氏篡齊之際。其記諸國世系錯誤最甚者，爲田齊魏宋三國。莊子曰：『田成子弑齊君，而十二世有齊國。』鬼谷子亦云然。今史記自成子至王建之滅，祇十代。紀年則多悼子及侯刻兩世，凡十二代，與莊子鬼谷說合。又齊伐燕，據孟子及國策爲宣王，非湣王。而史記於齊系前缺兩世，威宣之年誤移而上，遂以伐燕爲湣王，與孟子國策皆背。昔人譖孟子者，於宣湣年世，爭不能決。若依紀年增悼子及侯刻，排比而下，威宣之年，均當移後，乃與孟子國策冥符。此紀年勝史記，明證一也。史記梁惠王三十六年卒，子襄王立，十六年卒，並惠襄爲五十二年。魏齊會徐州相王，在襄王元年。是惠王在世未稱王，孟

子晝何乃預稱惠王爲王？又史記梁予秦河西地，在襄王五年，盡入上郡於秦，在襄王七年，楚敗魏襄陵，在襄王十二年，皆惠王身後事。而惠王告孟子，乃云『西喪地於秦七百里，南辱於楚』，何能預知而預言之？若依紀年，惠王三十六年改元，後元十六年而卒，則魏齊會徐州相王，正惠王改元稱王之年也。然後孟子書皆可通。又與呂覽諸書所載盡合。此紀年勝史記，明證二也。史記魏文侯三十八年，魏武侯十六年，而紀年文侯三十年，武侯二十六年，相錯二十二年。昔人疑子夏爲文侯師，已踰百歲。今依紀年，則文侯元當移前二十二年，子夏之年初無可疑。而李克吳起之徒，其年輩行事，皆可確指。此紀年勝史記，明證三也。史記魏惠王三十年徙都大梁，而紀年在惠成王九年。閻若璩本此論，紀年不可信。然細覈之，惠王十八年，魏圍邯鄲，齊師救趙，直走大梁。三十年，魏伐韓，齊田忌救韓，亦直走大梁。又秦孝公十年，卽魏惠王十九年，衛鞅圍魏安邑降之。此皆魏都自惠王九年已自安邑徙大梁之證。據紀年則史記之說皆可通。專據史記，則自相乖違，不得其解。此紀年勝史記，明證四也。三家分晉，田氏篡齊，爲春秋至戰國一大變。其後魏齊會徐州相王，秦亦稱王，宋亦稱王，趙燕中山韓魏五國又相約稱王，爲戰國中局一大變。史記於此年事多誤，未能條貫。今據紀年，證以先秦他書，爲之發明，而當時情實，猶可推見。此紀年勝史記，證明五也。其他不勝縷舉。要之，紀年乃魏史，魏在戰國初年，爲東方霸主，握中國樞紐，其載秦孝公前東方史實，自當遠勝史記六國表。徒以存十一於千百，不明不備，不爲學者所重。霸業千年，未覩豁闕之期。余粗爲比論，而積古疑晦，頗資發蒙，則其書之非不信可知也。

史記之誤不一端，而有可以類比件附，以例說之者。如誤以一王改元之年爲後王之元年，一也。梁襄王元年，實梁惠王稱王改元之年。魏文侯元年，實魏文稱侯之年。宋王偃元年，亦宋偃稱王之元年。齊威王卒年，實齊威稱王之年。此其例一也。有一王兩謨，而誤分以爲兩人者。如梁襄哀王一人兩謨，史記誤分爲襄王哀王。趙烈侯又謨武侯，史亦分爲兩侯。楚頃襄王又稱莊王，史公不知，遂誤以莊矯爲春秋時莊王之苗裔。此其例二也。有一王之年，誤而移之於他人者。如魏文伐秦，在周威烈王十七年，史誤以爲卽魏文之十七年。齊宣王五年，與驕忌田忌謀救韓伐燕，史誤以爲齊桓公五年。逢澤之會在梁惠王二十七年，史誤以爲周顯王之二十七年。齊魏戰馬陵，本梁惠王二十八年，史誤以爲乃周顯王之二十八年。又如齊康公二十一年，乃田侯剡立，史誤以爲桓公午立，皆其例三也。亦有一人之事，誤而移之於他人者。如梁惠王會諸侯於逢澤，史誤以爲秦孝公。宋剔成逐桓侯自立，史誤以爲宋王偃逐剔成自立。此其例四也。有誤於一王之年，而未誤其並世之時者。如魏文滅中山，史稱在文侯十七年，實誤。而繫之周威烈王十八年癸酉，則不誤。齊魏相王於徐州，史以爲齊宣王。梁襄王皆誤。而繫之周顯王二十五年丁亥，實不誤。又如齊封田嬰於薛，應在威王時，史表在湣王三年，誤。而繫之周顯王四十八年庚子，較紀年僅後一年，亦不爲誤。此由史公自據秦紀，於周秦之年卽得之，於東方諸侯世次，則略而未能盡明。此誤其年，未誤其世之例，五也。有其事本不誤，以誤於彼而遂若其誤於此者。如楚世家簡王八年，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爲諸侯，與年表周本紀魏韓趙世家均不合。且旣稱

韓武子趙桓子其非稱侯顯矣。卽其自語亦不合。今考紀年，魏文移前二十二年，是歲實魏文始侯之年，則策世家此語雖誤，而實有其不誤者在也。又如魏世家魏武侯九年，使吳起伐齊至靈邱，而年表是時楚悼王已死三年。吳起與楚悼王同死，豈能重爲魏將？據紀年，魏武年代移前，則魏武九年，吳起尚在魏。魏世家此語固非誤。此由史公博採傳記，未加考定，雖有錯互，而轉得證成史實之真。其誤在彼而不在此之例，六也。亦有似有據而實無據者。如年表魏文侯十八年受經于夏，特以前年滅中山，有子擊下車避田子方事，遂連類書其事於此。春申君列傳春申君爲相八年，以荀卿爲蘭陵令，特以蘭陵魯地，是年楚取魯，故姑推以爲說。本無確據，而後人輕信，轉滋惑誤，其例七也。有史本有據，而輕率致誤者。如左傳昭公七年記及孟釐子卒，史遂誤爲釐子卒在是年。孔子世家因云孔子年十七，孟釐子卒。戰國雜說有淳于髡說齊威王以隱，威王感悟，國乃大治，威行三十六年。史公採之，因謂威王在位三十六年。其實威王前後三十九年，威行三十六年者，除其不飛不鳴之三年言之也。此史自有據，而輕率致誤之例八也。亦有史本無據，而勉強爲說以致誤者。如魏文侯本魏桓子之子，史記移文侯之年於後，遂謂文侯乃桓子孫，然亦不能說桓子子爲何人。年表文侯二十五年，太子罃生，本爲太子擊生。史公旣誤移魏文滅中山之年在前，因疑子擊不應轉生在後，率改子擊爲子罃。不悟罃在文侯時不得稱太子。又田齊世家齊桓公五年，聽鄒忌田臣思謀，起兵擊燕。田臣思卽田忌也。此本齊宣王事，史公旣誤以伐燕歸之湣王，桓宣字相近，乃以意移此於桓公。遂至鄒忌田忌皆已預列桓公之朝，史公

亦無以自解。此皆勉強彌縫，而不能自掩其誤之例，九也。亦有史公博採所據異本，未能論定以歸一者。如上舉楚世家簡王八年三晉始列爲諸侯，與年表周本紀魏韓趙世家定在楚聲王五年者不同。秦紀與秦始皇本紀列秦諸君年數不同之類。皆史公各據異本，自造矛盾之誤之例，十也。亦有史本不誤，由後人率改妄竄以致誤者。如孔子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載孔子往返衛宋陳蔡各節，及魯世表六國表載魯哀公以下諸君年數，抵牾顯見，尤難理說。此必後人竄易致誤之例，又一也。復有史本非誤，由後人誤讀妄說以致誤者。如史記孔子世家載孟僖子死在孔子十七年下，水經注因謂孔子十七適周之類，是也。斯二者，與前舉十例誤不同科。而要之凡史之誤，必有其所以誤。尋其所以誤者，而後其爲誤之證益顯。而其所以誤之故，亦每每有例可括。粗舉數端，不能盡備。讀吾書者，循此意而求之，可自得也。

且不僅於史記之多誤也。今所資以相比勘而知史記之誤者，有索隱諸家所引紀年，而諸家之文正亦多誤。讀史者愛其文，往往忽其事。史雖多誤而莫辨。注文樸率，尤嬾循省。遂有傳鈔失真而致誤者。如魏文侯初立在晉敬公六年，而晉世家索隱引紀年誤爲十八年，十八實六字之譌。此以形近而誤也。齊宣公四十五年田莊子卒，而田齊世家索隱引紀年誤爲十五年，脫一四字，此以脫落而誤也。秦本紀集解徐廣曰：『汲冢紀年云魏哀王二十四年，改宜陽曰河雍，改向曰高平。』考紀年終今王二十年，今王卽哀王，烏得有哀王之二十四年？按之趙世家徐廣所引，知係四年之誤。蘇秦傳正義引竹書紀年：『梁惠王二十年，齊閼王築防以

爲長城。今考紀年梁惠王十三年，當齊桓公十八年，後威王始見。豈得梁惠王二十年，遽有齊閔王？校以水經汶水注，則無湣王字。此皆以增衍而誤也。周本紀集解：『裴駟案汲冢紀年，自武王滅殷，以至幽王，凡二百五十七年。』而按魯世家，考公以下至孝公十四年，宣王崩，幽王立，凡二百一十六年，無魯公伯禽年。三統曆成王元年，命伯禽侯魯，伯禽卽位四十六年。上加周公攝政七年，武王克商後六年，凡五十九年。并下二十六年，統爲二百七十五年。此作二百五十七，是七十五爲五十七，以顛倒而誤也。如此，則紀年與魯世家年數本後二十四年，定鼎洛邑，至幽王二百五十七年。果如其說，自成王定鼎起算，裴駟何得云自武王滅殷乎？此條辨說，據朱右曾汲冢紀年存真。

又有竄易妄改以增誤者。韓威侯與韓宣王爲一人。今韓世家索隱引紀年鄭昭侯薨以下一節，支離錯亂，全不可解。此經後人改易而誤也。孔子世家索隱云：『按系家，湣公十六年孔子適陳，十三年亦在陳。』既云十六年適陳，不得十三年先在。若十三年在陳，適陳不待十六年。索隱語先後顛倒，乖誤可知。蓋索隱本云孔子以陳湣公十年適陳，而經後人妄竄一六字。

此經後人竄亂而誤也。又田敬仲世家：『明年復會甄，魏惠王卒。』索隱曰：『按紀年梁惠王乃是齊湣王爲東帝，秦昭王爲西帝時。此時梁惠王改元稱一年，未卒也。而系家及其後卽爲魏襄王之年，又以此文當齊宣王時，實所不能詳考。』今按索隱此條，梁惠王乃是云云，惠王下當脫一卒字。惟據紀年終今王二十年，其時乃周赧王十六年，秦昭襄八年，齊湣王始二年。年表齊秦爲東西帝，尙在其後十一年。時惠王已死三十七年，且紀年亦不及載齊秦爲東西帝事。索隱何從按紀年謂惠王卒乃是齊湣王爲東帝，秦昭王爲西帝時乎？此

必有誤，而特不知其所以誤。後人專據此等處，疑索隱所引全不可信。不知此已爲後人竄亂，定非索隱之真也。朱氏存真王氏輯校此條均未錄。又諸家之文，短澀簡質，雖列異同，未加剖辨。後人間或依信，引爲論據，復有失其義解而誤者。如王國維古本竹書輯校采錄索隱甚備，雖論校未密，然已多失原解。如魏世家索隱引紀年：「惠王二十八年，與齊田勝戰馬陵。又上二年，魏敗韓桂陵。十八年，趙又敗韓馬陵。」此以二年十八年皆在二十八年前，故云上上卽前也。而王氏以爲上二年，乃卽二十八年之前二年，因謂卽二十六年，是誤解索隱原文也。又索隱引紀年亦自有例。如晉世家索隱引紀年，自出公以下諸公年數，皆列其與史異者以相勘。則其不著幽公、敬公、烈公，正見其年數之同於史。梁氏志疑不明此例，又誤混於今本爲紀年，遂致錯淆。又索隱引紀年列國國君年數，自魏君外，或據其始立之年數之。古者君主以翌年改元，紀年魏史惟魏君著年數，他國僅記君立，索隱循其立年數之，則與史記以改元計者相差一歲。後人不明此例，比論亦遂多歧。至其君卒歲，若以改元計，與始立計，亦每有一歲之差。此均由未得其例而致誤者。亦有索隱本無其例，而後人爲之曲說，如王氏古本竹書輯校謂索隱引紀年皆改夏正爲周正，而細覈實無之。此又致誤之一端也。

史文旣多誤，首有賴於諸家之注，而注文復多誤，其事又可舉一例以爲說者。史公記六國時事，多本秦紀。固已苦其不載日月，文略不具矣。然其於秦事，固宜信也。乃自宣公以上，史皆失其名，不能詳。索隱按世本古史，考得繆公名任好，以爲之補。其他可以想矣。今史文任好字，又係後人據索隱增入。而其記秦列君年數尤多歧。秦始皇本紀

後序列秦之先君立年及葬處，索隱謂其「皆當據秦紀爲說」。又云「其與正史小有不同，然亦未能定其是非。蓋史公亦自不能決，故取異說備列之也。」文云「秦自襄公至二世，六百一十歲。」正義云「秦本紀自襄公至二世五百七十六年矣，年表自襄公至二世五百六十一年，三說並不同，未知孰是。」又秦本紀索隱引始皇本紀云「秦自襄公至二世，凡六百一十七歲。」然則言秦年者，自襄公至二世，已有四說：

一、秦始皇本紀原文。

二、正義計秦本紀年數。

三、正義計年表。

四、索隱引秦始皇本紀。

今爲細覈，史記記秦襄公以下列君年數，本有二歧。

一、秦始皇本紀實得五百七十二歲。

二、秦本紀實得五百七十七歲。

三年表，則爲五百七十一歲。

合之以上四條，凡得七說之異。梁氏史記志疑云：『案年表自襄公元年至二世三年，實五百七十一歲。』

秦本紀原文實誤，索隱正義所說年數亦誤。此記是秦史官所錄，史公采以作史記者，何以誤端疊見？蓋篆隸

遞變，簡素屢更，傳寫乖譌，非秦記之舊矣。」此史文多誤之一例也。惟以余論之，其多誤之故，實有不僅梁氏所謂『篆隸遞變，簡素屢更，傳寫乖譌』而已者。請仍據秦始皇本紀爲說。紀云：『九年乙酉，王冠。』

集解徐廣曰：『年二十二。』

正義：『按年二十一也。』

史記載始皇年極明備，可以無歧，然集解正義爲說又自不同。且觀其相爲校正，決非傳寫之乖譌也。殿本考證杭世駿釋之云：『徐廣云二十二者，以踰年改元計也。正義云二十一者，以當年改元計也。』徐廣以是年爲二十二，故三十七年崩時，注云年五十。如正義之說，則崩年止四十九。六國表周赧王五十九年，秦昭王五十一年，徐廣曰乙巳，則始皇生年當是壬寅。十三歲時，當是甲寅。項羽本紀注徐廣曰：『項王以始皇十五年乙巳歲生，則始皇元年當是乙卯。』此處自當以踰年改元計，作二十二歲爲是。但秦本紀云：『獻公立二十四年卒，子孝公立。』徐廣曰：『獻公元年丁酉，孝公元年庚申，則獻之末卽孝之初，又不拘踰年改元之說矣。』今按杭氏此辨，分別集解正義得失甚是。蓋其所以爲計者不同，而遂致相差，其事初非關於傳寫之乖譌也。而其論獻公年則又有說者。考秦始皇本紀：『獻公享國二十三年，』而秦本紀云：『獻公立二十四年卒，』兩說自不同。杭氏謂獻之末卽孝之初，不拘踰年改元之例，其實非也。不踰年而改元，古人自有其事。然大率前君被弑，後君以篡逆得國，不自居於承前君之統緒，則往往卽以前君見殺之年，改稱篡立者之元年，不復踰年而

改元。此在春秋時不多見，而戰國屢有之。若孝公則非篡立，獻公亦非被弑，何爲亦當年改元哉？據秦紀，獻公前承出子，出子二年，庶長改迎獻公於河西而立之，殺出子及其母沈諸淵。其事亦見不韋春秋當賞篇。出子春秋作小主，庶長改。蓋獻公實弑君自立，故未踰年而改元。出子之末，即獻公之初。元丙申，卒己未，得二十四年。今年表於出公二年後始列獻公元年，則爲元丁酉，當得二十三年。始皇本紀與年表同，徐廣亦本年表爲說。杭氏不能詳辨，誤以徐廣本年表之說推論秦紀二十四年之文，遂誤爲孝公不踰年而改元也。

余又考秦始皇本紀載秦列君年數，與秦本紀異者凡五人：

一悼公	秦始皇本紀十五年	秦本紀十四年	年表同秦紀。
二靈公	秦始皇本紀十年	秦本紀十三年	年表同始皇本紀。
三簡公	秦始皇本紀十五年	秦本紀十六年	年表同始皇本紀。
四獻公	秦始皇本紀二十三年	秦本紀二十四年	年表同始皇本紀。
五莊襄王	秦始皇本紀三年	秦本紀四年	年表同始皇本紀。

而年表與秦始皇本紀同者，自靈公以下凡四人。其事皆可本前例以爲說者。

一靈公

秦始皇本紀『肅靈公享國十年』，索隱云『紀年及系本無肅字。句立十年，讀表同。句紀十二年。句』

然今秦紀作靈公十三年，三說相歧。余考秦紀靈公前懷公爲諸臣所圍，自殺。靈公承之，蓋亦不踰年而改元，故前後共得十一年。年表則於懷公四年見殺之明年，再書靈公元年，故爲十年。今秦紀作十三年，索隱引秦紀作十二年，皆爲十一年之字訛。

二簡公

秦始皇本紀『簡公享國十五年』，年表同。秦本紀簡公十六年。余考簡公前承靈公，靈公卒，子獻公不得立，簡公乃靈公季父，爲懷公之子。靈公旣承懷公之弑而自立，不踰年而改元。今簡公亦篡獻公之統，上溯其父懷公之緒，則亦不俟踰年而改元矣。年表始皇紀作十五年，仍依踰年改元之常例計之也。秦紀作十六年，本當時不踰年而改元之變例計之也。

三獻公

已具前論。惟秦始皇本紀獻公享國二十三年下，索隱云：『系本稱元獻公立二十二年，表同。紀二十四年。』今按索隱此條，文義頗晦，而有誤字。其句讀當如前引肅靈公條之例。

肅靈公 索隱：『紀年及系本無肅字。句立十年，讀表同。句紀十二年。句

獻公 索隱：『系本稱元獻公。句立二十二年，讀表同。句紀二十四年。句

均謂秦始皇本紀立十年，立二十二年，與年表相同，而與秦紀則異也。至引系本及紀年，僅舉其無肅字有元

字之異，並不與下文立十年立二十二年語相涉。句讀之例既明，知獻公條索隱立二十二年，實立二十三年之誤。以今年表明作二十三年，秦始皇本紀亦明作二十三年也。否則不辨句讀，不訂謬字，將又疑世本別有獻公二十二年一說矣。

四莊襄王

秦始皇本紀『莊襄王享國三年』，年表亦同。秦本紀莊襄王得四年。余考秦紀莊襄王承孝文王後。孝文王除喪，十月己亥即位，三日辛丑卒，子莊襄王立。秦以十月爲歲首，孝文王蓋以去年即位，以今年歲首除喪稱元，前後三日而卒。莊襄王處此變例，雖非弑君自立之比，而即以是年稱元，不復以先王三日之位，而虛一年之號，亦自在情理之中。秦本紀據當時變禮實況計之，故爲四年。始皇紀及年表依常例，仍定孝文王在位一年，則莊襄王自祇三年也。孝文之事，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亦復論及其言曰：『秦本紀昭襄王四十二年，先書十月宣太后薨，繼書九月穰侯出之陶。四十八年，先書十月韓獻垣雍，繼書正月兵罷。似已用十月爲歲首。秦自昭襄以後，莊襄以前，既首十月，則孝文王之事，有可得而論者。』秦本紀五十六年秋，昭襄王卒，子孝文王立，尊唐八子爲唐太后，而合葬於先王。韓王衰絰來弔，諸侯皆使將相來視喪事。孝文王元年，赦罪人，修先王功臣，褒厚親戚，弛苑囿。孝文王除喪，十月己亥即位，三日辛丑卒，子莊襄王立。蓋昭襄王五十六年庚戌秋去孝文王元年辛亥冬月，僅二三月，此二三月殯喪葬之事，明年新君改元，方大施恩禮，至秋期年之喪。

畢，然後書孝文王除喪，猶勝旣葬而除者多矣，猶爲近古。然其失禮處，亦不可不知。秦既用建亥月爲歲首，孝文王元年，應有十月，今于除喪後又書十月，分明是孝文王已踰二年矣。豈享國一年者乎？故予以莊襄王元年壬子，原孝文王之二年。但秦之臣子，以孝文甫卽位三日，不仍之爲二年，遂改爲莊襄之元年。觀晉子莊襄王立下無事，可知崩年改元，厥由於此。一年二君，固已非終始之義。况又革先君餘年，以爲己之元年乎？失禮莫大焉！惜千載讀史者，俱未推究及此。余特摘出，以正通鑑孝文王元年書十月己亥王卽位三日薨之誤。

今按閻氏此辨，精矣而未盡也。其謂秦自昭襄以下，莊襄以前，旣首十月，則誠然矣。而定孝文在位已踰兩年，則又失之。孝文亦旣葬而除喪耳。昭襄王以庚戌之秋卒，二三月間，竣喪葬之事，孝文以歲首十月正改元之位，三日而薨，前後不踰五月。若以歲首正月計，則尙在昭襄三十六年庚戌，烏得有二年之久？徒以孝文之立，年已五十有三，非孺子君比。又親莊襄之父，雖不幸卽位三日而死，而秦之君臣，不忍沒其先君在位之年。又孝文固已踰年而改元，又不當上侵昭襄畢世之歲。故以孝文繼體嗣位之數月，仍屬之於昭襄之三十六年，而所謂孝文在位一年者，其實則自踰年改元，僅得三日之數。其子莊襄王若仍以踰年改元，則爲壬子。而辛亥一歲，實亦莊襄享國之日。戰國季世，何嘗有所謂三年之喪？更亦何嘗有所謂三年喪畢而正踰祚之位之禮？三月而喪畢，踰年而改元，此其常耳。至於秦者，尤不當以東方儒生所唱古禮律之正。惟孝文在位不出五月，故史乃無事可紀，特曰『赦罪人，修先王功臣，褒厚親戚，弛園囿』爲循例虛美之詞。而莊襄王享國之期，